

历史上王朝更迭,基本规律是廉而建国、腐而失权,都没有逃脱由廉而腐、由兴而衰的历史规律,统治者的信誉危机和群体官僚的奢靡之风是历朝历代无力回天的历史性难题。唐代诗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透过两千多年“兴勃亡忽”的历史迷雾反思教训,以德治国,以德治政,有德者居之,是朝代兴盛、国泰民安的历史前提。

我国历史上西汉的“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隋朝的“开皇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无一不是以德治国、以德治政的结果。史称尧“定历”禹“治水”开创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尧“顺天而行”,“垂衣而治”,勤政爱民,感化四方,无为而治。尧因“四岳咸荐”,氏族长老认可,与其九子相比较,最后把治事权交给了舜。舜不负众望,顺应民心,耕于历山,陶于河滨,渔于雷泽,治理国家28年,靠爱民得天下。禹由部族联盟、氏族长老推举继承舜位,其吸收父亲治水教训,变堵塞为疏导,开掘黄河下游淤塞,支流通畅归入主流,围堰造湖,蓄洪防害,劳身焦思,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水患消除,造出万顷良田,爱民行动垂范千古。有德者居之,成了原始社会维护氏族首领的习惯法,也成了后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朝代更迭和吏制好坏的“魔咒”。

自古以来,人民一盼政治清明,二盼官员有德。这两条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以民为本,仁政德治,勤政爱民,廉洁奉公,诚信守法。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苛政多而仁政少,清者少而浊者多,廉者寡而贪者众。当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究其本质而言是人治社会,重大决策出自帝王之口,吏治和廉政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或争夺天下为根本目标,其廉政建设始终是在各利益团体的斗争与平衡中进行。专制体制中,一般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廉政措施一旦与政治利益冲突,轻则被弃之不顾,重则背道而驰。但也出现了不少真儒、清官、廉吏,有的宽厚仁爱,爱民如子;有的敢言直谏,为民请命;有的廉洁奉公,严拒贿赂;有的不畏强权,执法如山。

一

政治清明,德为根本。在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指取得并执掌天下、管理并教化人民。关于“清明”,《诗经·大雅·大明》有“辟伐大商,会朝清明”;《岁时百问》有“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有“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的话,可见“清明”指从美好时令引申出的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主要来自于“君圣贤贤”、“官清吏廉”的“圣贤政治”,实质就是“德治”。“德治”主张由周公较早提出。周公将君德、臣德、官德、民德以“礼”的形式颁布施行,并身体力行,实现了几十年“刑罚不用”的清明之治。孔子继承和发扬了周公的“德政”思想,形成了更加完备的“德治”思想体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以君臣圣贤人格为价值目标的德治思想精华,经战国孟子、汉代董仲舒和宋代朱熹的进一步阐扬,绵延影响至今不绝。纵观中国历史,尧、舜、禹、周文王、汉文帝、唐太宗等,都是能践行君德的“圣君”,而“贤臣”更是不计其数。当“圣君”遇上“贤臣”,一个清明时代就应运而生。当然,历史上昏君奸臣比比皆是,理想中“垂拱而治”的清明之世往往是昙花一现。不过,“德”作为政治清明的坚实基础,却是毋庸置疑的。

自古以来,没有经历800年不改朝换代的天下,但普天之下都有经历千年而不衰的道理。一个朝代更替时间或长或短,是因为拘泥于开国祖宗创制的陈法,不能弃旧图新,与其后来者奋起改革而取而代之,不如主动自觉进行改革以求长治久安。正如《易经》所说,事情到了穷尽的时候就需要变革,变革了就能通顺,通顺了就可以长久。

二

春秋战国500年,政权组织破旧立新,时代变革脱胎换骨,王室权威名存实亡,争霸与兼并中,势力不再是血缘与名分,而是富国与强兵的实力和“德法并举”的治国模式。治国之本在于治官,废除官员特权,官民同守一部法律,将法典悬挂在城楼上,供万民观瞻,还把刑律铸在鼎上,摆放在街头巷尾,特权阶层违法难逃,也监督执法者滥刑于民。以德教化,以法约束,开了中国法治的先河。《史记·循吏列传》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执法如山的故事:李离为晋国的审判员,他听汇报说一个在押犯重大恶极,于是判了死刑。后来发现只听了一面之词,杀错了人。他主动找到晋文公要求抵命。晋文公说,这是你下面的官错杀了人,不是你的罪错。李离回答:我是长官,不能让下面的人为我承担责任,我受大王的俸禄很多,也从不与属下分享。现在是我听了下面的陈述,经过自己的判断而发生过错,杀了无辜之人。因此我不能文过饰非而让下属代我受罚。于是伏剑而死。

秦国以风卷残云之势实现天下统一,在统一前秦国便以商鞅变法开始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还设计出一套完整、细致的廉政措施。各级官员不再世袭,由君主求贤,朝廷征辟,官举孝廉。有德者居之,要求官员廉洁诚实,通晓法令制度,官场行事合规,忠于职守。以德行用,选官中最严厉的一招是,哪位官吏所荐之人有了过失,推荐者要负责,甚至要受同罪处罚。“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无等级”,秦太子犯法,商鞅毫不手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发现单靠管理系统内部官吏相互监督是不够的,就像马夫监督马夫一样,因为相互之间的利益一致就会串通一气,只有让马说话,马夫才无法隐瞒罪恶。于是建立了从上而下的独立于行政体制之外的官检官制度,带有法官性质的监察使,发现行政官吏侵害百姓利益,或玩忽职守,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官吏和百姓同犯一样的罪,官吏处罚重于普通百姓。这可能是中国监察制度的雏形。

汉朝曾出现过历史上罕见的吏治风貌,提出过“先百而后己”,“移风易俗”,“武将不惜死,文官不受财”等让百官畏惧的勤政节俭风尚。廉政首先是有德者居之,把德才兼备的人选人官吏队伍,用铁面无私的人来监察监督。让御史拍马、逢场作戏、专横霸道、鱼肉百姓、丑态百出的官吏受到民众的道德谴责;让既有雄才大略、治乱兴邦之才,又有集思广益、为政公允之德的人担当重任。汉曹操“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政治主张,以道义和良心的力量,凝聚起民众强大的向心力。曹操本人率先垂范,各种诏书、指令、手諭均言简意赅,有的两三百字,有的只寥寥数语。他曾作《内诫令》:“孤不好鲜饰严具,用新皮苇筒,以黄苇缘中。遇乱世无苇筒,乃更作方竹器具,以帛衣粗布作里,此孤平常之所用者也。”意在自上而下清除功勋颂德、追求形式、喜好华靡的官场恶习。为了整治“投上所好”、“报喜不报忧”的官场,曹操发出了《求言令》,自上而下说真话,尽管忠言逆耳,他认为批评的话犹如真金难如登天。他每月初一向主要属官发送格式表,填写自己的述职报告,对上不要作颂辞,对己不要一律表功,对上要提批评意见,对己要说过失原委。曹操创立了官吏的

“面谈”程序和“面谈”制度,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走出“围城”招揽人才,汉代举官,德行第一,“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用此三者来考核官员的品德与政绩,出现了政风朴素、政令简洁、人民少受烦扰的现象。

三

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节俭则倡,淫逸则亡。惟俭则助廉,惟恕则成德。西汉桓宽写了一部叫《盐铁论》,其中有一篇憎恶贪婪的文章《疾贫》阐明了一个观点:上层官吏要在廉政方面作出表率,否则自身不正而要下属官吏正派是不可能的。贿赂的风气,好像江河奔腾而下,水源不枯水流不止。大官在朝廷搜刮财利,朝廷认可,小官在下面拒绝贿赂是不可能的。上一级官府向县里要,县里要向乡里要,乡里要向哪里要?“欲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

有德者居之

□丹增



己身。”这句发人深省的名言,佐证的是贪婪卑鄙的在领头的人而不在下面,需要教育训诲的是当政者而不是百姓。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蜀汉时期的诸葛亮曾著书立说,把东汉以来“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原因归结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五毒”,即因公为私、乘权作奸;扶强抑弱,法令不均;纵容罪恶之吏,百姓无处申冤;贪图爵位升赏,加重百姓负担;官场喜好奢靡,官员贪图享乐。不但找到了问题,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己教人”,“立身俭约”,以自己的言行作百官的示范。他说:“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诬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他还说:“人君无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有人曾劝诸葛亮进爵为王,被他义正词严地拒绝,并劝说他不应该贪图名利。他生活简朴,“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执掌大权,却不藏私心,光明正大,开诚布公,带领蜀国官吏立身俭约以安百姓。

讲道德自律,前提是人要有羞耻之心。礼仪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培养人的大节。不知羞耻就会无所不为,投机取巧的人,是没有地方用得着羞耻之心的。张伯行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任福建巡抚,礼部尚书,老百姓称赞他为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康熙皇帝赞扬他为“操守为天下清官第一”。他1709年调任江苏巡抚时,发现官场充满着对官吏送礼行贿、对上司拍马溜须、对百姓敲诈勒索的不正之风。为整肃官场,他发布了一道亲拟的反贪尚廉令。他明确保持自身的廉洁,尽力为国家服务,是官员应该遵守的礼法;常存仁心,爱护民力,保护资源,是搞好吏治的根本。他直言:近来一些不良风气腐蚀官场,使官吏们的行为正品行、坚定气操每况愈下,他们搜刮民财以中饱私囊,对民间疾苦置若罔闻;敲诈勒索民脂民膏以向上司献媚讨好。控制下属的办法是看贿赂钱物的多寡,奉上上司的手段则以通关节、献歌曲为能事。他指出,其实有万贯家财,也不过四个自身温饱就够了。为官者的政策宽一分,老百姓就多一份恩惠。你贪了一分钱,你的人格就受一分钱的污染。老百姓称呼你我为“父母官”,你我就称呼他们为“子民”,这就应该想到子民中孤独无依无靠者,由我们安抚体恤;子民田地被豪强侵占,由我们伸张正义;子民财物被盗贼劫掠,由我们驱赶缉捕,使我们体察民间疾苦,以仁爱心对待人民,人民才能拥护爱戴我们。这才叫父母官,切不可用见利忘义的权术去剥削残害老百姓,切不可掉进钱眼儿沾满铜臭。

四

政安之本,惟在得人。公正无私,选贤任能。政治是否清明,关键在于用人。能者在政,贤者在位,才是百姓之幸。直接接触老百姓的基层官员素质如何在,对民心向背与政权稳固关系极大。评判贤能者的重要标准在于贪廉与否,廉者能够约己而利人,而贪者则损人而利己。冷面寒铁,一是清则无私刚正,二是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

一个国家,由于能够任用贤能人才而以兴成盛,因为独断专行而走向衰亡,这是必然的趋势,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有贤才而能用,真是国家的幸运,有贤才而不用,等于没有贤才。天下比夜明珠还要宝贵、比美玉还要重要的是人才,而往往不易重视的也是人才。珍珠隐藏在蚌壳里,美玉深藏在石头里,与田螺蛤蚧、土瓦石头没有两样,但把它剖开凿开,哪怕是愚蠢的人也知道是珍珠美玉。人们钻高山,下深海,冒着老虎豺狼鳄鱼的危险寻求珍宝。而比这贵重的人才,往往在你的左右,甚至在眼皮底下,就不去寻访,弄不好还要讥笑一番。阻碍选贤任能的另一个阻力是因循守旧、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俗话说:“新官忙得像石碾子那样团团转,旧官却像石猴子那样逍遥自在。”在古代,士子考取功名开始做官的时间,大概30到40岁不等,平均30岁为限。新科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当翰林,算是最光荣的选拔了。但从前科士升到尚书职位大概要30年时间,升到大学士职位,又要10年左右。造成贤良有才者终身得不到破格提拔,从30岁出任,最后官至宰

相、首辅,为一品大臣时,头发已白,牙齿已掉,虽是老成持重,但变得顾虑重重、畏缩不前。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勇于任事者不受激励,玩忽职守者不受惩戒。

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吕览》中,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缺个县令,你看谁去当合适?”祁黄羊回答:“解狐行。”晋平公问:“解狐行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大王只是问谁当县令合适,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于是就起用了解狐行,百姓都觉得他干得很不错。过了一些日子,晋平公又问祁黄羊:“朝廷少个军官,你看谁可以担此重任?”祁黄羊回答:“祁午能行。”晋平公又问:“祁午不是你儿子吗?”祁黄羊回答:“大王只是问谁当军官合适,没有问谁是我儿子。”于是又起用了祁午,后来百姓都称誉祁午很称职。祁黄羊这样公而忘私、举贤不避亲的品质不就是今天官员举贤的榜样吗?

五

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才之人。庆历年间,跟随范仲淹主张改革的人被保守派扣上“朋党”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呈给仁宗皇帝。此文中讲明了官场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所信奉的是道义,实践的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誉节操,君子法成联盟,是因为共同坚守道义,为国效力,为民服务,就能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小人所喜爱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时,会暂时勾结在一起争抢先抢利益,没有共同利益时,交情就疏远,甚至反过来自相残害,即使是他的弟兄、亲戚也不会相互保全。官场做大事,要齐心协力,一万人一万条心做不了事,一千人一条心就能办成大事。



守廉慎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徇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暗者,各举不才之人。庆历年间,跟随范仲淹主张改革的人被保守派扣上“朋党”的罪名,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欧阳修写了一篇《朋党论》呈给仁宗皇帝。此文中讲明了官场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君子所信奉的是道义,实践的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誉节操,君子法成联盟,是因为共同坚守道义,为国效力,为民服务,就能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小人所喜爱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时,会暂时勾结在一起争抢先抢利益,没有共同利益时,交情就疏远,甚至反过来自相残害,即使是他的弟兄、亲戚也不会相互保全。官场做大事,要齐心协力,一万人一万条心做不了事,一千人一条心就能办成大事。

六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顺应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本、爱民是一切政治的根本。社会主体是民而非官,政治重心是民而非官,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政之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古语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东汉会稽郡太守刘宠体恤民情,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段鲜活的廉政佳话。

刘宠在会稽郡任职满3年,奉召赴京。这次成千上万的会稽百姓不约而同聚集到江边的十里长亭,顶香跪送。刘宠只带了两名随从,除随身衣物被褥别无他物。即将登舟启程,他抱拳作揖:“我怎敢接受父老乡亲如此送行,请快站起来,回家务农吧!”说着把百姓一个个扶起,互道珍重。刚要转身作别,忽见后面急急匆匆赶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渔翁,大喊:“大人请留步!”老渔手里拎着5条金色的新鲜大鲤鱼,来到他面前。“老人家有何吩咐?”刘宠关切而和气地问。“大人就任以来,帮我们疏通了河道,又为我们处除了渔霸,使我们能安居乐业,现在您离任而去,我特受沿江渔民之托,为大人送行。”说罢,老渔翁双膝跪地。

刘宠慌忙将渔翁扶起说:“我任职3年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有些事办得还远远不够称心,如今您这么年纪还赶来送行,我实在过意不去。”“我们素知大人喜欢吃鱼,你买鱼总是分文不少地付给我们。这次大人离我们而去,再也吃不到这江中的鱼了,今天我受沿江渔民之托,特奉上5条鲤鱼,请大人笑纳。”说着双手把鱼呈上。“谢谢大家的一片心意,可这5条鱼我万万不能收,请老人家带回去吧!”“我们敬重大人是官清正,万不敢以鱼来玷污大人的英名,这次送鱼是因不舍大人离任,略表寸心。大人倘若拒绝,不是伤了我们一片真挚之情吗?”老渔翁眼里含着泪水。刘宠望着渔翁饱经风霜的脸不禁动容了,他从渔翁托着的5条鱼里缓缓取过一条,深情地说:“老人家重了,我收下这条鱼,收下大家对我的的一片情意,您说好吗?”老渔翁激动地点点头,拎着余下的四条鱼依依不舍地和他爱戴的太守作别。

刘宠站在路边,默默地目送老渔翁远去的身影。他吩咐随员打开自己简陋的衣箱,取出10文钱向江边不远处一家馒头铺走去,随从不解地问:“大人,您这是做啥?”“这条鱼大约值10文钱,我把这10文钱买成馒头,喂江中之鱼,算没有占百姓的便宜。”待船至江中,刘宠亲自将馒头一个个掰开,抛入江水之中。

七

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深谙民主之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事迹至今广为流传,《贞观政要》从三个方面讨论为君之道:一是把握创业与守成的关系。创业历险,固然艰难,但创业后要更思安危,安而能惧,这对于君临天下的帝王来说,守业岂不更难?二是正确处理君民关系。明君善言古训:“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君不能“竭泽而渔”,逼使百姓起来造反。三是正确对待君臣关系。君如头脑,臣如四肢,要密切配合,

皇帝应听取臣下意见,兼听则明,且要引导臣下敢于谏诤,以避免决策错误。

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商代忠臣比干,宋代铁面御史赵抃,明代清官海瑞,五代时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而立身的冯道,唐初大臣魏征、明于兼听的贤臣明尹。直言者,国之良药;直言之臣,国之良医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执政者坚持开放言论,允许人民自由发表批评意见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有重要意义。只有广开言路,才能体察民情,接受舆论监督,凡是违背百姓意志、压制批评意见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样的道理,连公元前722年的执政者都明白。当时的郑相子产以人民为师,以人民的批评意见作为治国理政的良药。郑国人民常聚集在乡间学校或议事场所,批评执政当局的是非得失。郑国大夫熊明建议郑相子产:“把乡间学校废掉,立即制止批评。”而子产不仅不同意,还说:“人民言论执政是好事,他们认为好的,我就努力推行,他们讨厌的予以改正,人民是我的老师,制止批评,就像防止河水大水冲决堤坝,不如开一些小缺口,以疏导水流使之畅通无阻,把人民的批评当作良药以治疗执政的弊疾。”

西周有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用高压手段压制舆论的周厉王。有一个开明的大臣叫召公,有一天,他向厉王报告:“老百姓忍受不了您的政令啦。”厉王很生气,找来几个巫师,监视抨击朝政的人,把那些批评者处死。于是老百姓不敢讲话,路上遇见熟人只能用目光示意。厉王很高兴地对召公说:“我已经制止了别人说我的坏话。”召公却直言:“您这是硬堵住人们的嘴巴罢了。封堵老百姓的嘴,后果比阻挡洪水还要严重。河流被堵,决堤泛滥,受害人很多;堵住百姓的嘴,也是这个道理。治理水患的人总是疏通河道,使得水流畅通;治理百姓的人总是开导人们畅所欲言。政事的好坏成败就能从老百姓的言论中体现出来。老百姓的话是您的心思后从嘴里讲出来的,堵住老百姓的嘴,执政者由谁支持呢?”厉王不听召公的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过了3年,老百姓造反,把厉王驱逐出国门,于是有今天的成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还有发人深省的名言“为成国者成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早在战国时期,有个大臣叫邹忌。身高八尺以上,体形容貌俊美。他早晨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自我欣赏,问他的妻子:“我同城北的徐公相比哪个更美?”妻子回答:“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呀!”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不太相信,就再问他的侍妾同样的问题,侍妾回答:“徐公哪能及得上您啊!”第二天来了一位客人,一起坐着说话,他又问客人:“我跟徐公谁美?”客人回答:“徐公不如你美啊。”过了几天,徐公前来拜访,邹忌仔細端详他,觉得自己真不如徐公美。徐公走了,他自己照着镜子看,觉得差得很远。夜晚躺在床上思考这件事,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妻子说自己美是偏爱,侍妾说自己美是害怕,客人说自己美是有求于自己。不顾实情的夸奖,要误国误民,于是邹忌上朝晋见齐威王,说:“现在齐国方圆千里,后宫嫔妃,左右亲信都偏爱大王,朝廷大臣、身边人员,没有一个不怕大王的,一国之内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不有求于王的,国王您受到蒙蔽已经非常严重。”威王一听很有道理,于是发布命令:“无论官吏还是百姓,凡是能当面批评指责王的过错,受上等奖赏;呈上书信劝谏王的,受中等奖赏;能在公共场所说国君的坏话,传到王耳的,受下等奖赏。”一个当政者能广开言路善于接受批评意见,不仅是个人之幸,也是国家之福。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谏太宗十思疏》的文章,这是唐朝时任谏议大夫的魏征给唐太宗的奏章。他认为古代君王开头做的好确实很多,但能坚持到底的不是太多。一般而言,得天下比较容易,而守天下比较艰难。原因是一旦得志,便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傲视他人,即使用严酷的刑罚监督人们,用威风怒气恫吓人们,人们只能表面恭敬,而内心不顺从。要大兴土木,就要想到百姓安宁;地位不巩固,要想到自我修养;骄傲自满,要想到虚心听取意见;害怕受蒙蔽,要斥退邪恶小人;一时发怒,要想到乱用权势。

七

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当今是知识更新一日千里的时代,从政者的学习更是当务之急。一天不学习,就落后一天,一月不学习,一年工作没有方向。这让我想起了战国时期荀况写的《劝学》。荀况认为,学习是不应该停止的,刀剑在磨石上磨过就变得锋利,君子在不停地学习,就变得聪明多智。不登上高山,就不知天有多高,不面临深渊,就不知地有多厚,不学习先贤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有多大,我曾经整天思索问题,不如坐下一片刻学习。堆积土石成为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就不会有明辨事理的智慧,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就不会有事业的巨大成就。他认为学习要以做圣人为终极目标,要学到死而后已,放弃学习如同自做禽兽,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不是向人炫耀。学习所需的知识,要像爱看五彩缤纷、爱听五音调和、爱吃美味食品,这样的学习自觉,权力淫威不能压服,事情繁多不能转移,任何干扰不能摧毁,生生死死坚定不移,道德情操高尚,个人意志坚强,顺应历史潮流,知识人格完美。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学如命,学习用功。后周时,他任军队的最高统帅,掌握了兵权。有一次,他随周世宗柴荣出征淮南,私载重货好几车。有人疑心他贪污金银财宝,向世宗告发。世宗立即派人去检查。才发现这些重车里装的全是各种书籍千卷,以备行车途中随时学习。赵匡胤之所以有勇有谋,知人善断,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同他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后来,他发动陈桥兵变,做了大宋皇帝之后,特下一道诏书,要各地吏民给宫中史馆捐书,献书的人经学士院考核,有才智的赏以官职。他坚持每天看书写字,有一天,暴风雨将要来临,他依然案牍在手,忽地在书桌前响起了一声惊雷,他毫不畏惧依然端坐不动地写下“吾案虽击,吾手终不之改”。此事一时被传为佳话,他奉行重文轻武的策略,促进了宋朝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古时,很多人并不把读书作为升官的资本,而主要作为修身的途径。荀况在另一篇叫《修身》的文章中,讲了“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家无礼则不一”。必须以礼法为准则,以自己的道德和学识明辨是非。比如:准确恰当地当面进行批评的人,是值得尊敬的老师;当面称颂阿谀逢迎的人,是极端憎恶的坏人。可人往往喜欢亲近阿谀逢迎的人,认为这些人忠诚可靠,远离或疏远忠诚批评劝勉的人,认为他们在氓毁或诬害。人不该用花言巧语取悦别人、闲言碎语损坏别人、道听途说攻击别人,凡用恶毒语言鄙视、嘲笑、谩骂别人的往往是自吹自擂说大话的人。当然一般过错,哪怕是伟人贤人在所难免。人的可贵不在于没有过错,而在于能认识过错,并果断改正。只要能彻底清除旧习惯,即使从前是盗贼,也不妨碍他今天成为君子,无论什么贤能官员,凡以揭发别人短处、揭露别人隐私,来换取自己正直名声的,都谈不上劝勉从善。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察,法教而不知理,坐糜糜粟而不知耻。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人一姓之兴亡,而在于千万人民之忧乐。在人们想象中,封建时代至尊至贵的皇帝,常常过着锦衣玉食、歌舞男欢、骄奢淫逸的生活,极难想象他们之中也有人会过着刻苦学习的生活。